

超出法度的艺术创新,只是猎奇

玉渊杂谭

陈莹

最近书法界有点“吸睛”。刚火了个以针管代替毛笔的“射墨书法家”,又有“盲书大师”走入大众视野。视频中,美女手捧长卷或身着白绢,大师则避免注视绢纸,提笔随意挥洒,还会自由发挥,“写”到美女身上、脸上。引得一众网友欢呼,如此创作,是涂鸦还是书法?

有人对此持宽容态度,认为无论射墨还是

盲写,都同书法界风行一时的“丑书”现象一样,打破了汉字的固有程式,其存在意义在于“打破规则”。

然而,首先被他们忽略的一点是,任何艺术形式都自有其基本规则。射墨、盲写等打破的是书法艺术的基本规则,与“丑书”绝非同一范畴。古时苏轼、徐渭、郑板桥等人的字,都曾被时人呼“丑”,但他们的作品大多只是造型上与主流审美风格有所不同,创作者所遵循的笔法基础和审美品位却未脱离传统标准——看似离经叛道,实则仍是对书法艺术的一种创新尝试。而射墨、盲写的创作方式,却

已脱离传统书法以汉字为主体、以笔墨为工具的基本书写框架。我们很难将大师们手舞足蹈在巨大白绢甚至人体上创作出的一团团墨迹,同汉字联系起来。

诚然,艺术创作并不排斥创新。晋书尚韵,唐书尚法,宋书尚意,元明尚态,中国书法正是在变创中传承至今。尽管不同时期流行的书风在变,但这种创新并非无源之水,凡是能够被广泛接受并流传下来的创新,一定秉承着艺术本身的发展脉络,保留着某些能够被普遍接受的基本准则。声称“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求”的苏轼,也主张要

“出新意于法度之中”,他和之后的黄庭坚、米芾等人在书法上的创新,是在转益多师之后,提倡在笔法、章法上自然流露创作情感,其作品的个性表达仍不脱艺术格式的基本外延。

射墨、盲书的问题,恰恰出在其只重创新不重法度。盲书创作者认为,自己是在尝试“放弃控制性,追寻纯粹的书写”。但脱离了笔力、结构、章法这些基本规则的控制,凌驾于书法“法度”之上的创新,或许只能算是创作者的一种猎奇。如此创作,或许称得上是在表演“行为艺术”,但与真正的书道,恐怕渐行渐远。

桂下漫笔

大高玄殿里的“寻宝人”

胡一峰



在景山与北海之间,有座大高玄殿。它是中国唯一一座明清两代的皇家道观,始建于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清代因避讳,而改为大高殿。400多年来,这座建筑历经沧桑。《燕都丛考》记载:“大高玄殿,明世宗崇道之所也。有牌楼,甚壮丽。民国六年,以南向一坊倾斜特甚,拆去之。今惟余东西两面。其题额,相传严嵩所书。”上世纪50年代,仅存的两面牌楼也被拆除,移到了中央党校。近年来,随着文保意识增强,大高玄殿正在接受整修。

在人们为大高玄殿的重新开放而惊喜的同时,也不应忘记这里一度是清代军机处档案的储藏地,属于昔日故宫博物院三馆之一的文献馆。作为清代总理军政要务的中枢机关,军机处档案对于研究清史及近代史的学者而言,不啻为一座宝库。这批档案转藏大高玄殿后没几年,即有学者来此寻宝。当时负责档案整理的单士元在《我在故宫七十年》一书中回忆:“军机处档案移至大高玄殿后,文献馆由单士元、刘儒林、张德泽、程文瀚等人进行整理,首先编制档案目录,计档案155种,并将折包按按朝代年月顺序,仿图书馆公开阅览之例,使学者可以到馆参观。当日利用军机处档案,写出学术著作,有社会调查所陶孟和、汤象龙、刘什如等教授,近代经济史蒋廷黻教授与《国际关系史辑要》,吴燕绍教授《蒙藏史料汇编》。”

这段话细节上尚可更正,但为我们重构大高玄殿里的“寻宝人”提供了线索。汤象龙193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随即到北平社会调查所工作,在所长陶孟和的支持下,他“组织人员大量抄录清宫军机处和内档档案中有关近代财政经济史资料达十二万件,其中一半以上实行了统计表格化,形成了半成品,可供研究之用。”这是我国史学研究运用统计方法整理大量史料工作的开始。在多年后写的一份“自传”中,汤象龙坦陈,大高玄殿的这段经历是自己学术生涯的第一项成绩。当年这个“寻宝”小分队里的成员也有学术侧重与分工。比如,罗玉东专攻厘金,刘隽关注盐政,而汤象龙本人则潜心于海关,毫无疑问,这些正是近代经济史肯綮所在,而几位寻宝人也都成了各自领域的学术权威。

单士元回忆中提到的蒋廷黻,是昔日的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本为外交史专家。而让他在后场扬名的则是一部篇幅不大却开创一代史学范式的《中国近代史》。他在大高玄殿里爬梯外交史料,选编了一部《筹办夷务始末补遗》。这不仅成为蒋廷黻本人治学写作之宝库,而且泽被后世。后来的美国史学大拿费正清,上世纪30年代初在中国访学,得到蒋廷黻的指点,完成了处女作《1858年条约签订前鸦片贸易的合法性》,依据的材料“主要来自藏于北大高殿未出版的军机处档案”。到了上世纪50年代初期,蒋氏当年的学生邵循正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当教授,依然从清华大学图书馆借出蒋廷黻选编的这套史料,指导自己的学生认真研读。

吴燕绍出生于1868年,光绪时中进士,清末供职于理藩部,民国成立后,在蒙藏院工作,精研边疆史地。他曾在北大大学教授西藏史课程,到大高玄殿查档时已年近六旬,或许是“寻宝人”中年龄最长的一位。史学家谢兴尧在《记大高殿和御史衙门》中感慨,吴老先生“老年勤学,诚为罕见”。而谢兴尧本人其实也是大高玄殿里的“寻宝人”之一,不过单士元的回忆中没有提及。谢兴尧当时的研究兴趣是太平天国,他是治学严谨的集子,经常看到有俘获太平天国之物送往军机处的记载。于是,他向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沈兼士提出到军机处看档的请求,沈说,储存档案册的房子那么高,档案一直放到屋顶,哪里有立身之地?好在管理档案的单士元与谢兴尧同出北大国学一门。单士元对谢说,我这里有两条规定,一是不许带毛笔和墨盒,只能带铅笔与纸片,二是给你找来一架梯子,你要看什么,自己爬上去翻阅。谢兴尧在档案山里查了好几天,没有发现自己想找的“长毛旗”“长毛功券簿”等材料,却意外地发现了天德王洪大全的口供。从1930年12月31日开始,《北平晨报》以“洪杨厄谗”为名连载谢兴尧的太平天国系列文章,长达16个月,连续刊登了106次,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此外,史学界的传奇人物陈寅恪也在大高玄殿“寻宝人”行列之中。陈寅恪在清华国学院的学生蓝孟博说,陈在清华时,不论天气冷热,经常乘车到大高殿军机处看档案。清代时的机密文件常以满文书写,这是最原始的史料,“先生一本本看,遇重要的就随手翻译”。蓝是东北人,暑假要回家时,陈寅恪给他一张单子,上面全是满文。陈说这些字在字典上查不到,但很关键,托蓝回吉林找懂满文的汉人请教。

顾炎武曾说过这样的话,“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币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春到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乎?”所谓“采铜于山”,就是治学著述从一手资料出发,“买旧钱”则是道听途说,袭用成说,转引摘抄。两相对照,高下立现。前面提到的大高玄殿里的“寻宝人”,不正是“采铜于山”的典型吗?

赵方臣指导 杨定华绘



寒武纪生命

作品展示了5.18亿年前寒武纪海洋生命的壮丽景观,动物造型取材于中国寒武纪澄江动物化石群。该化石群为揭示生物演化“寒武纪大爆发”的奥秘提供了极珍贵的直接证据,被誉为20世纪最惊人的科学发现之一。画面在突出生物门类多样性的同时,主要描绘了寒武纪霸主——奇虾,展示现代食物网已在寒武纪形成。

近日,在法国巴黎举办的第五届国际古生物大会上,该作品获古生物重建修复图(专业组)大赛第一名。

(图片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提供)

科学,神圣殿堂还是杂货铺?

字里行间

高博

“科学就是力量”印在教科书上,弗朗西斯·培根成了科学崛起的代言人。但美国人德博拉·哈克斯在《珍宝宫: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与科学革命》一书中回顾400多年前的科学,指出:培根不理解那时蓬勃兴起的科学实践,他描述的科圣殿乃是文人的一厢情愿。

培根理想中的科学,是有限、有钱、喜爱思索自然的绅士的一种实践。但这个定义不适用于《珍宝宫》书中那些伦敦科学爱好者,传达不出他们想要利用自然实现富有成效、有利可图的目标的意思。

“科学”一词出现在16世纪的英语,本是一个统称,涵盖了自然某个具体方面较小的兴趣,葡

萄栽培、炼丹术、采矿和数学都是科学。伊丽莎白时代,很多人都声称自己搞科学(而不是文人们所谓的自然哲学),伊丽莎白曾颁发专利证给“火炉制造科学”和“眼睛制造科学”。

伦敦的科学,是市民的社交,不是知识分子和贵族的沙龙。它更重视观察;人们交流实验,而不是交流理论;大家容许争论作为一种常态。那时还没有“科学家”,只有术士、匠人、外科医生、药剂师、钟表匠……

《珍宝宫》提出,在1600年,伦敦而非大学才是科学活动(后来那些活动才被称做科学)的中心。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忙于争鸣古典文献,伦敦居民却忙着制造精巧的机械、试验新机器和探索自然奥妙。

400年前的伦敦,是100多个教堂和数十个贸易组织的集合,是一锅纷纷扰扰的大杂烩。以教堂

为活动中心,文化人渴求新鲜的书籍。学生们购买国内外医学和植物学著作,以及科学仪器。市场繁荣,使得阅读、书写和计算技能广泛传播。并非所有伦敦人都读书,但大家都有机会交外国朋友,听到天下奇闻,见识海外新商品。戏剧繁荣,莎士比亚的同行不少。

培根在《新大西岛》中虚拟了一个“所罗门宫”:所有科学研究归于一个等级机构,一个圣贤来领导。哈克斯说:其实所罗门宫已存在于伦敦城,所有科学门类都有人摸索,只是培根瞧不上伦敦人的庸俗和大众化。因为伦敦人研究自然往往跟有利可图的生意混在一起。

无论文人是否瞧得起“小市民”,伦敦科学的繁荣与市民意识难分解:首先,伦敦人乐于让别人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其次,他们知道城里能找到每一行的专家,专业协助不难获取;另外,他

们乐于合作,各种公益事业都不缺人。一句话,在伦敦,各种偏才都可得到尊重与机会。穷困的移民,不知来历的医生,巷子里的烧炉匠,有绝活儿就有精彩的生活。

不像哥白尼和开普勒,伦敦科学人爱推新公式,建构新的宇宙体系。伦敦科学革命的基础有三:组建了学术圈,有解决争议的规则;重视数学、技术和工具的获得;人们动手探索自然,积累经验。

因此,当波义耳这样的人寻找充气泵实验的助手时,他才能知道谁打听、问些什么。《珍宝宫》指出:“每一位看似孤立的现代早期科学伟人身边,都围绕着一大群由工人、助理和技术人员组成的‘伟大群众’。本书会帮助大家理解这些‘伟大群众’的来历,阐述他们是如何学习和提升自己的技能和知识的。”《珍宝宫》描述的伦敦生机勃勃。培根描述的理想科学殿堂与之相比不免苍白。



邓稼先经历的一次失败空投核实验

吴明静 沈晏平 王燕 陈瑜

茫茫戈壁,两个从头到脚被防护服遮得密严实实的人,站在空旷的核试验场上。即使照片已经泛黄,年已九旬的许鹿希仍清晰地告诉来访者:高个儿的是已经走了32年的丈夫——两弹元勋邓稼先,旁边个子矮的是时任二机部副部长赵敏璞。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直肠癌晚期去世,年仅62岁。邓稼先去世后的一天,赵敏璞请许鹿希到家里,交给一张她从未见过的照片。

在核试验场合影留念是件很不寻常的事情。上世纪70年代末,一次重要的空投核试验发生重大事故,核弹沉重地砸在试验场区的戈壁滩上。通过简要叙述,许鹿希才得知丈夫生前经历了光弹落地事故。这次试验的核弹,从加工、运送到多次投放训练,时任九院(今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试验总指挥的邓稼先都亲自参与。起初,一切顺利。但正式试验那天,起爆口令发出后没有听到爆炸声,一分钟后没有见到升腾的蘑菇云——出状况了。

试验失败,首先要找到弹体,查明原因。在场的除了邓稼先,还有多个部门的相关领导,大家都心急如焚。

据邓稼先司机回忆,虽然有关部门立即安排了部队进场搜寻抢险,但邓稼先和赵敏璞连防护服都顾不上穿好,就从100多公里外的观测点坐车直接冲进试验场,奔赴爆心观察。可是,他们并没有发现碎裂的核弹。

晚上,搜寻部队传来消息:碎弹已经找到。邓稼先立刻召集九院各分队长开会,安排第二天进场考察,并反复交待要认真细致地工作,摸清相关情况。第二天,邓稼先带领考察小组分乘车辆进入爆心,赵敏璞同行。这是两人第二次进入事故现场,防护措施已严格到位。当行进入到弹落地点时,邓稼先

才发现,其实昨天他们已经接近弹坑了。

邓稼先深知碎裂核弹的核辐射将达到怎样可怕的剂量,但他顾不上个人安危,把司机和赵敏璞留在吉普车上,自己走到弹坑前仔细查看了弹体。直到他判断出爆炸原因为化爆,确定核弹设计没有大问题,才松了一口气。

在邓稼先的率领和指挥下,进入靶区的考察小组共七人。

到达弹坑后,总体设计室主任、试验总体设计负责人沈中毅把搜寻区域分为四个象限,将上风口的两个象限区域分给了同组的冯绍曾和栗润年,自己查看下风口。另外两人只用了半个小时就查看完毕离开,而沈中毅则耗时一个小时才查看完毕。

值得庆幸的是,那是没有风的好天气,核弹碎裂后泄露的放射性污染物没有随风飘散到更广区域。

回到营地,经专业医生测试,沈中毅等人身上的放射性剂量超过正常值几百倍,被立即送往青岛救治。沈中毅和同事们在研究自现场带回的大量资料信息,仔细查看当天影像记录,反复进行力学试验,终于查明,包伞技术不规范导致降落伞不能打开,光弹落地导致试验失败。九院的核弹设计没有问题。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武器研制任务异常繁重。邓稼先在生产和试验基地两头忙,完全顾不上自己的身体。当时基地的生活保障条件不足,缺乏新鲜蔬菜水果,人们吃罐头吃得叫苦不迭,邓稼先却不以为意,忙起来甚至还会饥一顿饱一顿。他把药交给警卫员代熬,药吃完了也没有找大夫重新号脉,许鹿希只能原样抓了药寄过去。喝了一阵子药汤,邓稼先感觉身体有了劲,让许鹿希把草药换成速溶的小袋颗粒。他就这样吃了两年中药。

邓稼先心里惦记着查清事故原因,很快就带着

图① 邓稼先(左)与二机部副部长赵敏璞在试验场合影。许鹿希供图



图② 参与考察的部分工作人员便装照。



图③ 防护服下的小组成员很难辨识,照片提供者介绍,个头最高的是沈中毅。图②③由冯绍曾供图

药回到位于四川三线的工作单位。

沈中毅和同事们深入研究自现场带回的大量资料信息,仔细查看当天影像记录,反复进行力学试验,终于查明,包伞技术不规范导致降落伞不能打开,光弹落地导致试验失败。九院的核弹设计没有问题。

此事已远,却永志难忘。面对核辐射危险,从大科学家到基层科研人员,从部委领导到普通工人、战士,大家毫不犹豫挺身而出,在他们看来,对得起国家,对得起这份事业,也就安心了。

扫一扫 欢迎关注 嫦娥的秘密 微信公众号

